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可持续发展研究

于海洪 张 婷 李加峰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可持续发展研究

于海洪 张 婷 李加峰 编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回顾与分析了中国百年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历程,对比分析了国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情况,并从大数据的视角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适合基础教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于海洪,张婷,李加峰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3-054811-5
I. ①基… II. ①于… ②张… ③李… III. 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IV. ①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231 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周 爽/责任校对:贾娜娜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蔡美宇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 1/2

字数:170 000

定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2015 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大数据的视角”，项目编号：15SKG172

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教师教育学科专业群资助成果

长江师范学院教育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序

大数据不仅把全球卷入了一个以数据、数据分析与预测为特征的时代，也带来了学习和思维的革命，给信息化教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使教育过程中的资源观、教学观、学生发展观等都发生了变化，导致研究领域、关注度等深刻变革。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领域，人类总是“在无法获得实证数据的时候纯粹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去发现未知领域的规律”。身处大数据时代，面对生产的科技化、生活的网络化、生存的娱乐化，阅读的快餐化、学习的泛在化、教育的理想化，我们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借由前沿技术的发展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个体，让跟踪每一个人的数据成为了可能，从而让研究“人性”更有了实操能力。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正”的学生。例如，翻转课堂创造了人性化学习方式，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制定一个自定进度的学习计划。萨尔曼·汗发现，那些在某个或某些概念上多用一点点额外时间的孩子，一旦理解了概念，就会很快进步。

本书在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大数据的视角”（项目编号：15SKG172）基础上研究撰写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力求用国际的视野，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突出学校教育问题，体现基础教育特色实现跨学科（跨界）思考基础教育改革问题。自2015年以来，笔者及同事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等多种方法，本着从实求知的原则和方法论，利用大数据技术（金数据、佰思问卷调查系统等）进行了海量调研。从时间轴上看，一直推演到清朝末期，也就是破除“科举制”以来；从空间地域轴上看，通过朋友推荐、文献记录一直延伸到欧美、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就实地调研而言，搜集的数据实际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热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有识之士的无私帮助，调查者深入到相关中小学实地查看课表，实地听课看课，验证某些事实。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边疆到内地，都留下了调查者的足迹。在这里需要感谢的有：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教育科的宋北荒，吉林省长春市一线教师马淑杰，甘肃

省白银市一线教师魏雅洁，河南省驻马店市一线教师王冶，湖南省宁乡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谢彩飞、主任丁常春和教师胡英，浙江省网络专家胡保坤博士、一线教师王佳权，江西省鹰潭市图书馆馆长谢春曼，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小学校长贾慧芝，广东省中山市一线教师刘金凤，上海市“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实验学校的部分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比较教育研究》主编鲍东明，以及重庆市江津区一线教师李海洋、涪陵区第十六中副校长傅孝燕、重庆市第十一中副校长李顺林、石柱县马武中学胡蝶和长江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全科 2015 级 2 班的全体同学。

本书在项目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海洪提出撰写提纲，于海洪、张婷、李加峰三位执笔写作。感谢项目主参研人员张婷、刘希娅、刘剑、夏敏、吴玉学、李加峰、王纬、曹秀娟、王殿东为研究作出的贡献。在书稿撰写过程中，笔者也学习借鉴了许多前人的同类型研究成果，并在本书中适当位置予以标注。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理论与实践结论支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前期研究和书稿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长江师范学院立项的“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教师教育学科专业群”“长江师范学院教育学学科建设”等项目的资助，得到了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冉隆锋博士、书记雷继红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此对为该项目完成作出直接和间接贡献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笔者的视野、水平有限，加之选题所具有的挑战性，书中难免存在错漏，敬请谅解，并请提出批评指正。

笔 者

2017 年 3 月 12 日

目 录

序

绪论	1
一、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1
二、大数据思维的研究视角	3
(一) 大数据思维方式的特性及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3
(二) 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6
第一章 历史与现代有惊人相似之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百年回顾与分析	9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回顾	9
(一) 洋务运动引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9
(二) 中华民国基础教育改革	12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学校课程设置	14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础教育课程的八次革新	16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特征	30
(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场深刻的价值变革	30
(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创新	31
(三)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落实任重道远	33
三、基础教育课程理论的反思	35
(一) 四个典型的课程理论	35
(二) 基础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37
第二章 小处瞬息万变, 大处岿然不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内外调查比较	41
一、国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文献研究	41
(一) 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对我们的启示	41
(二) 日本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变化	45
(三) 英国基础教育课程突出“交叉”的改革	50
(四) 德国中小学特色课程设置及实施	54
(五) 俄罗斯基础教育课程的继承与变革	58
二、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态势	63
(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状调查	63
(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典型案例	75
第三章 静态的知识急速变化的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是革命性的	82
一、大数据时代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83
(一) “互联网+教育”	83
(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再出发	85

(三) 大数据发展了时间管理理论	87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	88
(一) 核心素养的概念	88
(二) 核心素养的培养: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的逻辑起点	89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93
(一) 可持续发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命题	93
(二) 从实求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方法论	95
(三) 真正落实: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项	96
参考文献	102
附录	108
一、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癸卯学制)(节选)	108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	115
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节选)	122
(一)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122
(二) 深化教育改革, 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条件	125
四、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节选)	126
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节选)	129
(一) 课程改革的目标	129
(二) 课程结构	130
(三) 课程标准	131
(四) 教学过程	131
(五) 教材开发与管理	132
(六) 课程评价	133
(七) 课程管理	133
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34
七、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节选)	135
跋	141

绪 论

一、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本书涉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三个概念，由这三个概念组成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概念。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的明确提出，源于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 现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①。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做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研究者和不同国度的领袖给可持续发展下的不同定义和解读超过100种，被广泛接受、影响最大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该报告中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需要和发展，限制和发展，人与自然，历史、现在与未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持续性”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生态持续性”(ecological

① 曾珍香，顾培亮，张闻.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的研究[J]. 管理世界, 1998, (2): 209-210.

sustainability),意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序间的平衡。这是从自然角度说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为了能够使这个理念落地,人们就从社会角度来思考。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基本原则。这一定义强调了在保持底线的情况下,围绕现实的人来思考发展问题,把改善生活品质作为目标。后来还有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定义,例如,爱德华·B.巴比尔(Edivard B. Barbier)在其著作《经济、自然资源:不足和发展》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D. Pearce)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的福利减少”^①。侧重于科技方面的定义,例如,斯帕思(J. G. Spath)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封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②。

这些概念,好像没有和教育,更没有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里找到可持续发展与教育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明白人的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长远影响与结果;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认识自己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中大刀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应该不仅使人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也使人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这种主要形式,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说到这里,还是没有找到可持续发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联系,是不是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感觉呢?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持续发展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协调“发展”,要求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的变化呈现单调增态势(强可持续发展),至少其总的变化趋势不是单调减态势(弱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三大原则:公平性原则(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要给各国、各地区的人、世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 2003 中国可持续发展科技报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② 同①。

代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权），持续性原则（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共同性原则（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虽然不同，但公平性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强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理念应该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或者说课程设置、课程实施的原则、理念和基本要求。

因此，本书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要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实施、评价要与社会形态、经济状态、文化背景、资源状况、环境条件、生活水平相适应；使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的变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正向的，至少不是负面的和反向的；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必须坚持三大原则即公平性原则（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享受适宜的教育），持续性原则（课程设置应该不超越社会形态、经济状态、文化背景、资源状况、环境条件、生活水平和学生的承受能力），共同性原则（人才培养目标既要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也要符合国家的现实与未来的需要，更要符合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三者必须有机结合，不能偏颇）。

二、大数据思维的研究视角

本书从大数据思维视角，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理性的审视和研究，期望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和重构提供参考，促进课程改革顺利渡过深水区 and 转型期，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落实情况的具体调查，摸清中小学一线课程改革的真实情况，为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现实依据。

（一）大数据思维方式的特性及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大数据（big data）概念源于最早经历信息爆炸的学科，用于描述目标数据量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一般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情形。在众多领域都面临爆发式数据增长的今天，数据处理技术和工具随之蓬勃发展，可以批量处理或分析大量数据集，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处理数据的速度。美国互联网数据中心将大数据定义为通过高速捕捉、发现/分析，从大容量数据中获取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架构。大数据可以概括为四个英文字母“V”，即更大的容量（volume）、更高的多样性（variety）、

更快的生成速度(velocity)及由前面三个“V”的组合推动的第四个因素——价值(value)。

从对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结构的表述中,可以得出敏捷性、开放性、前瞻性和个性化是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的代表特征。“大数据”是十分流行的热点关键词,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借由前沿技术的发展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个体,让跟踪每一个人的数据成为了可能,从而让研究“人性”成为了可能。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正”的学生^①。也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将渗透到教育的核心环节,重构教育的评价方式,革新教育者的教学思维,为教育发展增加预测性判断,影响学校教育的模式^②。邵光华和卢萍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转载论文为样本,透视当前基础教育研究热点,发现基础教育研究重点关注了教育均衡、异地高考、大数据、高中多样化发展、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改革反思、教学探讨等目前的热点问题^③。

如果说大数据把全球卷入了一个以数据、数据分析与预测为特征的时代,那么,翻转课堂、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微课程则是大数据时代在教育领域引发变革的体现,它给信息化教学提供了新的平台,其资源观、教学观、学生发展观等都将发生新变化。翻转课堂创造了人性化学习方式。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制定一个自定进度的学习计划,即按照自己的节奏、步骤、速度或方式,随意地暂停、倒退、重复和快进。如果忘记了较长时间之前学习的内容,还可以通过观看视频获得重温。萨尔曼·汗发现,那些在某个或某些概念上多用一点点额外时间的孩子,一旦理解了概念,就会很快进步^④。

翻转课堂、MOOC和微课程是大数据给教育带来的第一好处和新的挑战,翻转课堂和微课程具有信息化教学前移的显著特征,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教学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新,使传统的以教师为核心学习资源向以教师资源网络资源等多资源转型,使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向以学生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并举转型,从而引发资源观、教学观和学生发展新变革,学生的

① 张轹. 大数据改变教育——写在大数据元年来临之际[J]. 上海教育, 2013, (10): 29-32.

② 喻长志. 大数据时代教育的可能转向[J]. 江淮论坛, 2013, 260(4): 188-192.

③ 邵光华, 卢萍. 我国基础教育研究热点透视与趋势展望[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6): 50-55.

④ 金陵. 中美“翻转课堂”比较及其思考[A]//徐福荫, 黄慕雄. 教育技术协同创新与多元发展.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 58-63.

学习更加灵活、方便，只要有较高的时间管理技能就能够管理好时间，使学习任务在愉悦中完成。

因此，师生自主管理时间成为可能和现实，解决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不适应当下教育综合改革的问题，可以促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深层次改革，帮助我们渡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水区。

可以说大数据挑战了传统的课程理论和教育改革基础，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和改革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不少的修正和质疑。

国外有关课程改革的专著有：《课程与教师》（佐藤学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佐藤学著，教育科学出版社）、《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藤田英典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现代日本教育课程改革》（水原克敏著，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改革：批判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斯蒂芬·J. 鲍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法国教育界寻求课程内容和学习方法的一体化，探索课程整合之路。在法国新颁布的学科教学大纲中，增加了跨学科的探究式课程，如“发现之路”“跨学科学习”“框架式个人学习”等，是法国 21 世纪课程改革的重要特点。

美国也在探索基础教育教学整合工作，《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指出，要成立“以技术推动教育”基金，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在公立学校中的广泛应用，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业成就，并使所有学生在 8 年级结束时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

2011 年开始，日本小学生 6 年的总课时达到 5645 节（每节课 45 分钟），比此前的 5367 节增长了 5.2%。初中生 3 年的总课时达到 3045 节（每节课 50 分钟），比此前的 2940 节增长了 3.6%。作为“宽松教育”代表的综合课将被缩减课时，而日语、数学、外语、科学和社会课的课时将增加 10%。科学和数学的课时更是分别增加了 33%和 22%。同时，课程内容增加，教材变得更厚。

英国政府也提高了教学质量要求标准和对达标情况的督查力度。截至 2008 年 6 月，有 634 所中学没有达到教学质量要求的最低标准。英国中小学生的数学、历史和地理知识等明显没有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丰富。2007 年，英国公布了新一轮的国家课程，对 12 门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都进行了修订。2010 年英国联合政府教育部发表的《教学的重要性：学校白皮书 2010》中，也对国家课程的改革进行了相关的说明，强调国家课程重视的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掌握。

法国教育部于2011年初开始实施“中小学创新与成功计划”。调整后的评估不但要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新课程的现实情况,还要对学生每年的学习成绩进行分析。

国内关于新课程改革的反思性研究及相关文献,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新课程改革进行的几场大讨论:关于“知识”的论争、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关于“新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论争、关于“新课程改革是否脱离中国国情”的论争等,诸多学者都参与到了此次大讨论中,这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讨论反映了教育的现实与理想教育的传统与现代等诸多矛盾。

2011~2012年《教育科学研究》连续刊发了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邢红军教授的一论、再论、三论“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他以物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为背景,对课程改革的教学方式、课程内容等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与质疑。他认为,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理论、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训练形式及研究行为偏离了基础教育的正确方向,均存在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①。②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与严肃的学术规范,再次从课程改革的教學走向、国情反思、理论基础、课程目标、能力培养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认真检讨与深刻反思,并得出结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上述诸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②。③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内比较、因材施教、思维训练、教材编写、讲授教学、教师教育等方面,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认真检讨与深刻反思,并得出结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③,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新课程改革依然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当前的课程改革研究大多关注于具体学科或某一层面,也有学者从文化、宗教、城乡差別的角度做过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还不够系统,课程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本书试图从大数据思维视角,用整合的思维围绕“学生”这个整体去思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改革的微观性和单一性,深入实践来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二) 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本书从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采用质和量

① 邢红军.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J]. 教育科学研究, 2011, (4): 5-21.

② 邢红军. 再论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J]. 教育科学研究, 2011, (10): 5-22.

③ 邢红军. 三论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J]. 教育科学研究, 2012, (10): 5-23.

的研究结合的方针，在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成果，采用“现状调查”（网络平台监测、实地调查、问卷调查）—“问题呈现”—“原因探讨”—“反思与策略建构”的技术路线。

为此，本书除了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调研方法外，还使用网络监控和测评技术，了解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策略在中小学的具体实施现状与问题；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对国内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地使用文献研究法、反思建构法等，从大数据思维视角审视和反思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提供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策略。

调查法采用了“大数据研究手段”——金数据软件和佰思问卷调查软件。

使用大数据技术，深入中小学一线，调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的真实情况，力争掌握全貌，能够重点剖析，找到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基于大数据思维视角，探讨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家政策全面落地的策略；探索如何将课程改革升华为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形成以培养学生核心能力为主线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模型。

本书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又在已有理论的指导下对现实进行了分析比较，探讨了新课程改革中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

本书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在中小学落实情况的“海量”数据调查，选择全国有代表性的省市中小学课程改革进行“从实求是”的调查；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文献研究；从大数据思维视角切入，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以培养学生核心能力为主线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模型及实现的路径、思路和策略。

本书撰写过程中，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特点：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现状的研究是通过调查“海量”数据，不算简单的“平均数”，不做“数学游戏”，力争“点面结合”，掌握全貌的研究方法。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从大数据思维的视角反思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探索能够使中小学一线，特别是教师群体自觉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策略和措施。努力解决课程改革与目前现行的人事政策、教育管理政策、传统的思维习惯产生的冲突。

通过研究得出，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新阶段，不是单一课程改革就能够奏效的。因此，需要直接从教育系统、课程改革本身出发，通过调查、经验观察及理论建构，探索其内含的深层复杂性，防止出现“两张皮”现象，要尽

力做到真正基于大数据思维视角反思新课程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本书力求转换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以大数据思维视角从整体上去思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运用整合、复杂思维方式认识、定位和调整新课程改革,尝试探索新课程改革的完善策略,使其得以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核心目的不是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谈改革,而是探索如何改变目前基础教育不适应时代变化这个现状:从被动适应大数据升华为主动运用大数据;探索解决中小学教师不想改、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

(1) 课程改革的理念、思路完全正确,得到广大教师和社会的认可,但是贯彻、执行还不平衡,已经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和转折期。启动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领域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变革;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迎接激烈国际竞争的挑战,实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要求;是培养21世纪符合素质教育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合格人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必然选择。但是,各地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别仍然存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盲区”,此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认真总结十多年来的课程改革的成效和经验,深刻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对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意义重大。

(2) 需要用互联网思维重新思考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确保可持续发展。通过跨界思维、整合思维等,在全面实施新课程的背景下,以科学的方法探寻新课程改革面临的困惑和问题,并以建设性的态度探索解决方案,有助于新课程更符合我国实际,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显现更大的教育价值,有助于全方位地开发基础教育新课程,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真正实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和“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

(3) 倡导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突出“达标+特长”的课程设计理念,增强基础教育课程理论的中国话语权。

(4)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核心素养的培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的逻辑起点;可持续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命题;从实求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方法论;真正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项。

第一章 历史与现代有惊人相似之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百年回顾与分析

从中国教育史可以了解到,有文献记载的教育可追溯到舜所设庠,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汉代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清末之前,虽然学校教育有所变化,但都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倡导“八股文”。一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真正的“教育革命”才初现端倪。从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就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了。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回顾

(一) 洋务运动引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一部分人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他们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外部和好”“内部和平”。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并没有因为这种暂时稳定局面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他们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教育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

① 宋群豹.“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近代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琐议[J].管子学刊,2005,(4):114-115.

② 何云鹏.冯桂芬变法思想刍议[J].长白学刊,2010,(6):107-109.